在鲁迅的旗帜下

——纪念现代著名文学社团『未名社』成立100周年

韦素园

台静农

韦丛芜

李霁野

“未名四杰”合影

台静农与张大千等友人

鲁迅护“未名社”

编者按：1925年8月，在鲁迅先生的倡议、筹划、赞助和领导下，“未名社”在北京成立。“未名社”前后存在了7年多的时间，正式成员达16位，除了鲁迅、曹靖华外，其余4位都来自现今的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他们就是被称作“未名四杰”的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

“未名社”是在鲁迅先生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的进步文学团体，也是鲁迅先生牵头成立的第一家出版社，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集翻译、创作和出版于一身的重要机构，也是五四运动后文学新人培养的重要阵地。

“未名社”成立后也就以译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苏俄和一些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为主。“未名社”翻译的作品体裁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戏剧、童话、散文诗等，涉及的国家有苏俄、美国、英国、法国、波兰、丹麦、荷兰、日本等。“未名社”出版的翻译作品主要有《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小约翰》(鲁迅译)、《苏俄文艺论战》(任国祯译)、《往星中》(李霁野译)、《穷人》(韦丛芜译)、《十二个》(胡　译)、《外套》(韦素园译)、《白茶》(曹靖华译)、《烟袋》(曹靖华译)、《争自由的波浪》(董秋芳译)、《文学与革命》(李霁野和韦素园合译)等24部。

通过“未名社”的译介，安特列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一大批俄苏著名文学家的作品走进中国文坛。其中，韦丛芜翻译的《穷人》是第一个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中译本，曹靖华翻译的《白茶》是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苏俄戏剧集，韦素园翻译的《外套》虽不是中国最早的译本，但却是影响最大的，其确定的果戈理译名一直沿用至今。

“未名社”顺应时代要求，倾力译介国外进步文学作品、文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特别是俄苏文学的译介，将俄国古典文学、白银时代的现代文学和“同路人”文学引进中国，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创作借鉴和理论参照，丰富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内涵，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及社会思潮开始了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转型，凸显了“启蒙与革命交织”的时代特征和精神追求，推动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未名社”对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20世纪20年代文艺理论的缺失，引起了国内了解苏俄文艺现状的兴趣，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和标本意义。

除了文学翻译，“未名社”还出版有专收文学创作的丛书(未名新集)，出版发行了鲁迅先生的文集(朝花夕拾)(坟)，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等书籍33部。

“未名社”青年同人在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文艺理论主张以及鲁迅先生的进步思想、杰出创作成就的深刻影响下，自觉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积极投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学创作之中去，在创作上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未名社”成员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方面成绩卓著。如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将乡村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在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台静农的《建塔者》主要是一部革命小说集，收短篇小说10篇，在文学中融入革命叙事。李霁野有小说散文集《影》等，其小说表现生的隔膜和爱的隐瘢，其散文充满真诚和质朴，对文学创作具有“深而细”的美学追求。李霁野被鲁迅先生称为“孤寂的发掘者”，他的创作受到鲁迅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也是鲁迅研究专家。

韦素园的诗文说、朴素、自然，具有感人的力量。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说韦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韦丛芜的诗集《君山》(冰块)是当时诗坛的不小收获。《君山》是他的爱情诗集，收情诗40首，笔调清新，情景交融，缠绵悱恻，真切动人。《冰块》为杂诗集，收杂诗12首。

“未名社”的出版物无论是译著，还是创作，在揭露社会黑暗、反对文化奴役、张扬自由意志、追求启蒙救国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未名社”成员表现出对社会、人生、文学的独特理解、深入思考和艰苦探索，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未名社”成员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鲜明的文学精神，也就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未名精神，其精神内涵就是“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务实精神，也就是泥土精神；在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影响下，关注现实困境，直面惨淡人生，向往光明未来，积极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从而形成的文学革命思想和启蒙救国精神；开启文学与革命的联结，在革命文学史中具有独特地位的文学革命精神。未名精神还包括甘为人梯、培养新人的精神，广采博取、引领新潮的精神，切切实实、严谨不苟的精神，身经百折、奋斗进取的精神，相濡以沫、舍己为人的精神。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皖西地方文化和革命文学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未名社”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未名社”领风气之先，是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上的一个亮点。“未名社”及其相关人员受益于鲁迅，也都终生热爱鲁迅，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传播鲁迅。如今在中国文坛上仍然非常活跃的霍邱(叶集)作家群，正在致力于传承鲁迅的伟大精神和跟自“未名社”的未名精神，努力开创皖西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新纪元。

(作者工作单位：皖西学院)

未名本色是革命

●蒋二明

一百年前成立的“未名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重要文学社团之一。“未名社”至今仍值得人们纪念，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革命性，换言之，革命性是“未名社”的鲜明特色，当时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成为革命运动的先导，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方面。“未名社”成员也如涓涓溪流，汇入到革命的滚滚洪流，并在革命洪流中激荡起清奇的浪花。

二十世纪初叶出生于皖西叶家集的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等人自幼就受到爱国教国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启蒙，读小学时就带头冲破封建迷信和守旧顽的重重阻挠，把叶集三圣宫内的大小菩萨全都推倒砸烂，把明强小学的牌子挂在三圣宫的大门前，在门内庙柱子上贴上他们自己写的对联：“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门头横联是“开化民智，教育英才。”毁庙宇改学堂之举震动了叶集五里长街，一时成为人们的中心议题。这体现了他们从小就立志好学、敢于破旧立新、敢于斗争的精神。

1916年起，他们陆续进入外地中学学习，又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参加了一系列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春，韦素园还参加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接着同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等人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韦素园将自己学过的《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书刊寄给家乡的亲友和同学，引导一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同年夏，韦素园、蒋光慈、曹靖华等人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坚定了革命的信念。韦素园决心以研究学习俄语进步文学唤醒民众为终生事业。

1922年秋，韦素园与曹靖华提前回国加入相国解放斗争的行列，韦素园考入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课余剪苏波波苏俄作家的著作，次年开始选译苏俄文学作品。这期间，他先后邀约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曹靖华等人到了新文化发祥地北京，他们有着同样的信念：中国有光明的前途，要为之实现而贡献力量，决心以文学唤起民众，振兴中华。

“未名社”以翻译出版俄国、北欧、英国、日本文学为己任，在引进和介绍苏联文学方面更是独树一帜，借助于鲁迅的影响力，“未名社”很快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引起文坛的关注。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新文化的旗手，更是“未名社”的主心骨。“未名社”成员紧紧团结在鲁迅周围，埋头苦干，为新文化运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未名社”的作品是进步的，其成员更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他们执着地追求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文化，执着的实践是“以笔作刀枪”，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直是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发展的，他们的心一直是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几年间曾两次遭反动派的查禁，有的成员被拘捕过两次。更加可贵的是，“未名社”还掩护过一些共产党员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中共北京市委的刘重与他们关系密切，刘重牺牲后，他们曾写下诗和文章以作纪念。职业革命者赵赤坪曾多次被捕，常被反动特务跟踪、盯梢，但“未名社”成员不惧风险，收留赵赤坪在社中安顿下来。赵赤坪以“未名社”职员身份搞发行做掩护，在京津一带发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建立党的组织。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韦丛芜和赵赤坪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游行示威，他俩在执政府卫队镇压的弹雨中都受了伤，但仍奋不顾身地抢救重伤学生；韦丛芜从伤亡者的人堆中爬出来后，急忙奔向鲁迅住处，愤怒地诉说了惨状，遵照鲁迅“我们绝不能沉默”的教导，韦丛芜写下血泪淋淋的控诉诗篇《我投着血衣爬过寥廓的街心》(我踯躅、踯躅，有幽灵)、《在(莽原)半月刊上发表，鲁迅也写了《记念刘和珍君》发表在《语丝》上，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这样的诗文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中勇毅精神的见证。

“未名社”以文化工作的公开身份掩护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在需要营救同志时，也往往由“未名社”出具铺保。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等人均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捕，出版、销售的一些书刊也被定为“赤化书”而遭收缴。1928年秋，来自家乡霍邱的革命者王青士、李何林、王冶秋等人因发动“文字暴动”遭追捕、通缉，陆续到北京投奔“未名社”。为了解决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未名社”在景山东街40号开设一个门市部，出售图书并供人阅读。王青士等人找到党组织后便离开“未名社”，仍以主要精力开展革命工作。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六安市委史志室)

文学园林中的『泥土与森林』

●马德俊

1925年8月的一天夏夜，住在北京城西三条胡同“老虎尾巴”的鲁迅，率领着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一群青年，组织的文学社团“未名社”破土而出。

事情的起因是在1924年的冬天，在北京崇实中学读书的安徽霍邱叶集青年李霁野，通过自己的同乡、在北京世界语学校师从鲁迅的张目寒的介绍，将从英文翻译的安特列夫的《往星中》书稿，呈送在鲁迅面前。

看到“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李霁野时，这位冷峻的导师眼中释放出了一股暖意。这股暖意，也通过李霁野，释放到他身边正在文学和人生道路上奋斗着的一群年轻人。鲁迅建议“我们试办一个出版社”，专门出版社员的创作和译作。办社所需600元的资本被拆解成6份承诺：大先生独自承担起半数，余下的由5个清贫学子分扛。鲁迅开把自己的译作(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首先交付出版作为开门书，这种赤诚和信任，催生了“未名社”的问世和成长。

鲁迅解释“未名社”并非“没有名目”，而是“还未想定名目”，寓意如初生婴儿般充满发展壮大的可能。鲁迅在“融洽”的合作中看见的不只是青涩的文字，更是青年们“宁作泥土”的孤勇。鲁迅像园丁修剪幼苗般指点译稿，修改作品。韦素园略血的笔尖不停地在(外套)中游走，肺结核的阴影与爱恩陀耶夫笔下饿国人民的苦涩重叠；台静农在(地之子)里埋下皖西的乡愁和淮南民歌，让乡野的寂辛长出文学的树苗；李霁野翻译(简爱)时，英国桑菲尔德庄园的月光与自家后院“小南海”的湖光在译稿里层层出相映的风景；笔丛芜的诗集《君山》闪耀着青春的光芒，让鲁迅称赞是“青色”可看的诗章；曹靖华译自苏俄的《烟袋》和《铁流》，如同乌拉尔山和大别山一样苍茫悲壮。他们蜗居在北京沙滩新开路的“破寨”，用俄语、英语词典充作枕头，翻译苏俄和北欧的作品。鲁迅和这些20岁左右的青年，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将异域的巨石推向中国文学的山巅；像普罗米修斯受尽苦难，为中国的奴隶偷运起文的“军火”。这个中国文学的荒原上的“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在文学的阵地上耕耘，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中一片茂密的森林。

最难忘的还是“未名社”7年时间创业艰难中的相濡以沫。因为译介苏俄作品被政府当局以“共产党机关”搜捕招致了“未名社”成员的牢狱之灾，铁窗内外传递的不仅是慢头，更是普罗米修斯的火种。韦丛芜从“三一八”惨案死人堆里爬出去向鲁迅报告这一惨景，鲁迅参考其他资料为此写下《纪念刘和珍君》那篇震撼千古的檄文。当韦素园病重西山，社员们轮流送药的身影在西山小径上流连不断。从上海到北平探望母亲的鲁迅也坐着营运的摩托车前去西山看望。韦素园病逝后又是鲁迅写下《韦素园墓记》，称赞他虽非“天才”或“豪杰”，却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小撮泥土”，为之发出“文苑失英”的慨叹悲鸣。大先生为年轻人改稿的墨迹、那些垫付的还散发出体温的印刷费，最终凝成《鲁迅全集》里温暖的注脚。鲁迅先生以背荷为盾牌，为这群年轻人挡住时代的寒潮风云。这种支持让“未名社”成员的译著总带着体温，温暖着寒冬里的读者。“未名社”还成了一群革命者的落脚点，王青士(龙华24烈士之一)、李何林(南昌起义参加者)、王冶秋(时任中共霍邱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文物局局长)、赵赤坪(叶集著名革命烈士)等先后在此避难，并在“未名社”的帮助下开展业务，之后再根据需要投身革命征程。

我们特别不能忘记的是飘落在台湾岛的台静农先生。抗战胜利光复了台湾，可是这个宝岛历经半个多世纪日据时代，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中国文化的土壤几近荒芜。台静农以一腔孤勇，携着鲁迅“移栽乡野泥土气息”的文学理想，在台湾大学的龙坡里，重整中国文学的脉络。台静农以笔墨为舟，以讲台为渡，将《诗经》中黄河长江先民的激情凝结成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胎记，《楚辞》优美词章中生长着的爱国忧愤，《史记》的雄浑沉郁，唐宋传奇的神奇，岳飞《满江红》中的爱国情怀，《红楼梦》的高峰突起……都化作同里山的松涛、日月潭的碧波，滋润着台湾岛这块干涸的文化沙漠。

台静农以学者的坚持，将台大中文系铸造成一座中华文化的灯塔。那些从他手中接过文化火把的学子，如欧丽娟等，多年后仍记得他诵读《离骚》时微颤的嗓音——那是跨越海峡的中华之音，是文化血脉最深处的震撼。而今，台大文学院的廊柱间，仿佛仍回荡着他用安徽口音吟哦的同章诗句。那些同章诗句从《地之子》的乡土和淮南民歌中皮纱而来，穿过战火与波涛，最终在龙坡里的书斋里落地生根，长成又一处中华文化园林中的风景。

百年后再看“未名社”同仁那些合影的黑白照片和泛黄的未名丛书和杂志，模糊的身影和薄脆的纸页上依然跳动着赤子的心跳。他们证明了：文化的火种不必是耀眼的火炬，也可以是深埋地下的根系。今天，安徽叶集的未名湖畔，鲁迅和几位学生的雕塑仍在复述当年的故事；“未名社”纪念馆的墙上，集来的鲁迅的墨迹依然灼灼如新。这群“无名的泥土”，终究长成了守护文学星空的森林——每片叶子都写着：未名者，非无名也，乃待后人续写其名。

(作者工作单位：六安市委宣传部)

『未名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马启俊

“未名社”不仅是一个以翻译、出版为志业的现代文学团体，更是一处暗暗燃烧着革命火种的进步堡垒。鲁迅“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栽植奇花和乔木”的信念，在这里获得了最质朴，也最炽烈的诠释。泥土无言，却滋养了最倔强的根茎；未名无声，却让一批共产党人得以在刀丛剑树间呼吸、生长、再出发。那个特殊年代，“未名社”的灯火下，曾映出多少中共党员坚毅的身影。

1925年，在天津从事工运的中共党员赵赤坪因遭北洋军阀通缉，星夜入京。“未名社”让他以“发行员”身份留社，白天跑邮局、跑书摊，夜晚跑交通、跑组织。1928年，霍邱“文字暴动”失败，李何林、王青士、王冶秋等被列为“首要”，亦相继潜至北平。“未名社”把他们统统收作“小伙计”——站柜台、跑印刷、包邮包，既给了饭碗，更给了屏障。张林一、李云鹤、宋日昌等陆续来归，或借钱，或借宿，小小门市部成了风雨北平的“红色驿站”。

赵赤坪，1902年生于叶集，1923年来到北京并进入俄文专科学校学习，同时在天津、北京一带从事党的工作。自1925年“未名社”成立后，他开始以该社职员身份掩发行做掩护，在京津一带发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然后去政府请愿。这个爱国行动遭到国民政府的残暴镇压，当场牺牲40多人，伤数百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未名社”年龄最小的韦丛芜和作为先锋战士的赵赤坪参加了这次爱国示威游行。在弹雨中他俩都身负枪伤，但是他们还奋不顾身地抢救重伤学生，引起了军阀暗探的注意。此后，赵赤坪的行动，常被反动特务盯梢，接着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组织上考虑到赵赤坪处境的危险，同时根据工作需要，便派他离开北平去广州参加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赵赤坪转战鄂豫皖，三次入狱、三次“踢破牢门”。1930年又被迫潜回北平，仍在社内打工。1933年，赵赤坪再次被捕，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酷刑之下，他咬定自己是“卖书跑腿”的，故人章不到证据才将他释放。他回到家乡叶集后，仍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组织领导群众抗日。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叶集成立南霍县，赵赤坪被委任叶集镇镇长。大军南下后，叶集又陷入反动派手里，赵赤坪举家逃十人进山打游击，1948年4月19日弹尽被俘，不为敌人的严刑利诱所动，1948年4月22日，壮烈牺牲。

王青士，1907年生，原名王之绍，霍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家乡霍邱县举行“文字暴动”后，为免遭国民党反动派抓捕来到“未名社”。公开身份是“未名社”门市部的“伙计”，与李何林一起，负责书刊印刷、校对，出售各进步书店、出版社交换来的书刊。在从事党的工作的同时，他除了卖书外，还兼画广告和设计书籍封面。1931年1月，王青士代表山东省委到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被捕。2月7日深夜，王青士和同时被捕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柔石等24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龙华，是上海龙华革命烈士之一。

李何林，1904年生，霍邱县人，1924年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随军北伐开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霍邱“文字暴动”后被通缉，远逃北京，投奔“未名社”中的好友李霁野，被“未名社”接纳。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鲁迅论》(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的生平和杂文)等。

王冶秋，1909年生，霍邱县人，王青士胞弟。1925年入党时年仅16岁，人称“‘未名社’小老弟”。站柜台、跑印刷、烧锅炉，样样抢着干。1927年冬，张作霖侦缉队围捕，台静农借来一件破棉袍、一葫芦墨汁，把他塞进煤车连夜送往天津，转海轮南下。这段经历后来被台静农写进小说《昨夜》，刊于《莽原》。

(作者工作单位：叶集区文旅体局)

红色星火，『未名社』中的革命身影

●毛玉山

——赵赤坪、王青士、李何林、王冶秋等共产党员活动侧记

在谈这个话题时，我想首先应从鲁迅先生对“未名社”的重视程度说起。

1925年8月，安徽叶集籍的年轻人——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到北京鲁迅寓所拜访鲁迅先生，谈到翻译，鲁迅说，现在翻译亟不很景气，译作少，质量也不好，对读者没有什么吸引力。鲁迅又谈到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常去的丸善书店，丸善书店最初创办时，规模很小，后来由几个大学生逐渐把它经营起来，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书店。鲁迅那时正在编辑两样期刊：一本是专门发表创作作品的《乌合丛书》，一本是专门发表翻译作品的《未名丛刊》。鲁迅说：“不如，你们把《未名丛刊》拿过来自己办，你们的译作也有地方发表。”

大家都很兴奋，积极支持。于是“未名社”“”正式成立。“未名”就是取自《未名丛刊》之“未名”二字，意思是“还未想定名目”的意思。

鲁迅作为精神领袖和指导者，负责总体方向，韦素园则承担具体社务，如编辑、联络、发行等。1925年12月，“未名社”出版了第一本书，即鲁迅译自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此后，《未名丛刊》陆续翻译推出了大量俄国、东欧文学作品。“未名社”成为当时我国介绍外国文学、推动和促进本土文学革新的重要阵地。同时，“未名社”还接办了鲁迅主编的周刊(莽原)。为“未名社”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鲁迅成立“未名社”的初衷，就是希望中国青年以“未名社”为阵地，翻译和介绍优秀外国文学，借鉴外来成果，开展新文学运动，传播新思想、新文学，通过这些翻译作品启发国人思想，对抗当时的封建旧文学与保守势力。

“未名社”的成员多为青年创作者，通过平台和鲁迅的帮助，他们很快就提升了创作能力，为新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及时为“未名社”翻译了大量俄国、东欧等国的进步文学作品，很快就成为了中国进步和革命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

从“未名社”刊登和出版的作品来看，他们不仅翻译了大量的俄国与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而且还创作了一批揭露现实和批判传统文化的作品。鲁迅先生对“未名社”的工作相当认可，他说：“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未名社”成为当时旧中国大地上的一块生机盎然的绿荫。

鲁迅认为“未名社”是一个有实绩且踏实做事的文学团体，“实地劳作，不尚叫嚣”，成员都“愿意切实实、点点滴滴的做下去”。肯定了“未名社”成员踏实做事的态度和团体作风。此外，鲁迅还认为“未名社”出版了不少“相当可看的作品”。如韦丛芜的《君山》、台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等，肯定了“未名社”的实绩和成果。

鲁迅对“未名四杰”都有各自不同的评价，特别是对韦素园评价极高。鲁迅认为韦素园是“未名社”的核心人物，称“‘未名社’没有你办不起来”。韦素园去世后，鲁迅亲书碑文，赞誉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赞美和肯定了他的默默奉献精神，认为他虽然不是天才或豪杰，但却是中国所需要的踏实做事之人。而事实正是如此，1931年韦素园因病去世后，“未名社”没有了能挂帅的关键人物，加上其他原因，“未名社”便自动解散。

鲁迅对台静农的小说十分偏爱，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为了台静农的《天二哥》(红灯)《蚯蚓们》四篇小说，与自己入选的篇数相同。鲁迅评价其小说时说，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竟做了文艺，且在当时争写恋爱遗欢，都会明暗之时，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没有比他更多，更勤的了。

鲁迅对李霁野的翻译工作较为认可，李霁野翻译了《简·爱》(战争与和平)等作品。鲁迅曾在书信中与李霁野交流翻译相关事宜，指导其翻译工作，体现出对他的关心与扶持，认为他是“未名社”中踏实做事的青年之一。

鲁迅对韦丛芜是有过批评，但也肯定了他的文学成就，认为他的诗集《君山》是较为出色的抒情诗作品，并将其作为《未名新集》之一出版。此外，鲁迅还希望韦丛芜能专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最好能把全集译完。韦丛芜听从鲁迅先生的教诲，从1924年开始，一生致力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独自译完了陀氏全部24部近300万字小说。他用他的辛勤付出和成果，不负鲁迅先生的嘱托。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明强小学与“未名社”骨干成员的成长

●黄圣凤

1915年2月，叶集明强小学开班，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李霁野同时进入第一班学习，在各科老师的阵容里，包含江姐人、台介人、叶兰谷、台寿民、曾更愚、董琢堂、曾坦安、何棣伍、陈伯威、叶兰谷、曾厚寰等名字。这些人有的留学归来，有的受过国内高等教育，有的是反清的进步人士、人才，他们有能力，有情怀，不仅传播文化知识，也把开明进步之风吹到学生心上。

老师江籁人，毕业于设于省府安庆的安徽师范学堂，担任过安徽省立第三师范校长(1919)、霍邱县教育局局长(1926)等职，他深感“开启民智”的重要，主张同“西人争学”，提倡普及教育以救国。他本着一颗爱国心，离职后回家乡叶集办学。他认为“民生国势，赖以明赖以强也”，要求学生“明礼仪”“讲勤奋”“进取心强”，让明强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学校”。

老师台介人，日本弘文学院专科毕业，为人耿直严肃，学生们既怕他又敬他。他改变传统私塾教学的方式方法，主导推行新式教育，不准责骂学生，更不准体罚学生，形成良好的教风氛围。师生之间不再是封建的“师道尊严”，而是“心平气和”，“他笑容较少，略有傲态，……但也友好”。(李霁野语)

老师董琢堂(董卓堂)，秀才出身，经纶满腹。早年是李霁野的塾师，明强小学开班后，他进入新校，教国文和历史。他讲授的《论语》《孟子》等课程非常精彩。他效仿学生自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让他们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他通过讲授诗文，引申发挥，告诉孩子们“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的道理；他还“因材施教”，见书素园学而不厌，课堂所授已“吃不饱”，就常给他单独讲授；他对待学生“宽严有度”，讲情理，不一味苛刻严厉，被誉为“教学有方的楷模”。

老师孟振先，光绪二十年举人，宣统元年举孝廉方正，人品师德俱佳。本为霍邱县地方财政局局长，却心系家乡教育，辞官回乡创办蚕桑学校(1913年)，后转为明强学校。

老师韦凤章、乃韦素园、韦丛芜之长兄，教历史课。他知识面广，教育工作经验足，又有好口才。他的历史课既观点客观，又纵横捭阖，对学生历史观、人生观的形成，起到多方面的作用。

老师台林逸，保定陆军学校毕业，曾辞去军职回乡教书。他以行伍生涯的见识，给学生分析天下大势，预测社会动向，给学生思想启蒙。后来台林逸因家中人口多，生计艰难，又回军界任职。1925年，台静农等人和鲁迅办“未名社”，资金遇到困难，得到他大力支持，而且始终关切着家乡办女子学校的事情，有拳拳教育之心。

明强小学不仅培养了学生们扎实的国学功底，也打开了最初的视野，更重要的，接受新的思潮，飘见了时代变革的曙光！他们之后走进“未名社”，站在了巨人的身边，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他们在明强小学接受的教育使然。

(作者工作单位：叶集区作家协会)

未名之光：“四杰”的启蒙锋芒与乡土叙事

●陈永睿

十月革命为100多年前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未名四杰”都翻译了不少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韦素园译有《外套》《黄花集》《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最后的光芒》等；韦丛芜译有《穷人》《罪与罚》等；李霁野译有《往星中》《黑假面人》《被侮辱与损害的》等。“未名四杰”翻译这些作品，意在使中国人了解“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语)。暴露旧中国的烦疾，激起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寻求民生解放的愿望。可以说，“未名四杰”这些译著，对于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激发人民追求真理有着重要的启蒙意义。

“未名四杰”的主要成就在于翻译而不在于创作，但他们在小说创作上也作了有益的开拓，取得了突出成就，成就最大的当推台静农。台静农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著有小说集《地之子》和《建塔者》。大笔勾画了“人间的酸辛和凄楚”，展现了二十年代皖西农村的生活图景，这些“还保留些乡土的语言”的大地之子的不同遭遇，汇成了作者故乡农村生活的总体画面，反映了作者遵循现实主义创作规律、展示劳动人民疾苦的本色。正因为此，鲁迅对他的小说评价很高：“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

“未名四杰”都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情感真挚，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韦素园的病榻感悟、爱情书写、社会批判之作，或思索生命、或抒写真情、或针砭时弊，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写和分析，批判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李霁野的散文创作则以细腻的情感与质朴的笔触见长，体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与时代印记，或为乡土记忆与亲情眷恋，于日常琐事中融入对人生的思考、关注“人”的价值。台静农在台湾所著的散文集《龙坡杂文》等，笔法冲淡平和，引经据典而不晦涩，议论深刻而不玄奥，呈现出大巧若拙之美，成为雅俗共赏的“学者散文”典范，开创了台湾“隽永”一派文风。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很高成就的当推韦丛芜，代表诗集40节、600多行的《君山》。

(作者工作单位：安师大附属叶集中学)

游客们在参观叶集区红色文化展览馆。

学生们在聆听“未名四杰”故事。

“未名社”旧址

本版由中共六安市委宣传部
六安市新闻传媒中心
中共六安市叶集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
本版图片由中共六安市叶集区委宣传部提供